

永懷傅秉常先生

秉常先生著

記得在民國十二年初，我還在廣州國立廣東高等師範肄業的時候，一天，我偕友行經西堤粵海關大樓門前。這座大樓蓋得很宏偉堂皇，從馬路人行道邊，先要登上多級石階，然後是一條寬闊的走廊，走廊上一排高的大圓柱子，真是氣派十足，行人經過它的前面，總不免被吸引了要

多看幾眼。我們這時却見上面當中的一根柱子上貼着一張大紅紙條，自然就更注意，走近一看，原來貼的是粵海關新監督傅秉常就職的告示。

傅秉常先生的名字，當時之所以引起我注意，是因為在幾天前的報章上，見到孫大元帥發表命令，派他為廣東外交涉員。報上也說他曾任

我國派往巴黎和議代表團的祕書。但我從來不知他是怎麼樣的一位人物，更未曾和他晤談，現在又看到就任海關監督的要職，心想他一定是個很老成的長者了。

後來我于民國十五年春，由國立廣東大學派赴法國留學深造。民十七年我在巴黎大學，那時還是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負責人之一。是年夏天，聽到國民政府的大員胡展堂（漢民）、孫哲生（科）、伍梯雲（朝樞）、傅秉常諸先生將到歐洲考察的消息。六月，他們行抵巴黎。其時李石曾（煜瀛）、王亮疇（龍惠）兩先生也先到了巴黎。他們常常在一起，會商黨國大計。我這個學生小子，自然還攀

不上和這批黨國元老在一堂討論國家大事。但是因為我以駐法總支部的關係，也能沾光瞻仰他們的風采。他們之中，使我特別注意而引為驚奇的，却是傅秉常先生。因為在我的腦海中，一向總認為他也是一位老成長者。不料見面之下，他竟是風度翩翩的一位青年。原來這位歷任要職，而當時還擔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傅秉常先生，那年才三十剛出頭，不過比我大五六歲罷了。由此，我對秉常先生固然欽羨不已，同時也鼓舞了我見賢思齊的無比雄心。

自從此次我見過秉常先生，其後總難得接觸機會。民國十八年我代表駐法總支部，回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時，雖也見到秉常先生，却無機會相對談。我於會畢返法不久，即赴日內瓦國際聯盟祕書廳工作，一耽數年。至民廿四年秋返國，在廣州任職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。秉常先生則在南京，仍任立法院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長。大家雖同在國內，仍然兩地睽違，難得一晤。

民廿六年「七七」抗日戰起，我辭去中大教職。奉宋子文先生電召赴滬工作。由於戰事不斷擴大，政府西遷武漢。我也由上海而轉至武漢，



傅秉常先生任駐蘇大使時攝於莫斯科。

其時立法院亦已疏遷到了武漢。可是當那戰爭緊張，兵荒馬亂之際，大家都忙本身任務，很少私人聚合應酬的時間。而且就是在年年底，政府特派孫院長哲生和秉常先生等一行，組織了一個訪問團，前往歐洲，訪問英、蘇諸國，並向蘇洽借軍火貸款。廿七年秋間，訪問團任務達成東返，



傅秉常先生(左二)早年與蔣經國(左一)董顯光(右二)沈錡(右一)諸先生合照。

孫院長等先飛武漢轉重慶。而秉常先生則仍留港公幹，大約到年底才回重慶。

這時我在宋子文先生領導的國際反侵略會中國分會，也隨政府疏遷在渝，並在中央訓練團工作，總算又有機會和秉常先生碰頭了。而大家的工作却更為繁忙。不過由於我們是同鄉的關係，時有在粵籍同鄉前輩和親友座中，得與秉常先生晉接談。我總覺得他無論對年老的長者或青年的後輩，親密的朋友或陌生的客人，都一樣地親切自然，言笑雍容，純真坦白，毫無半點官味和俗氣。於是使我頓然明白，當他還很年輕的時候，就能獲得 國父和伍秩庸(廷芳)先生的器重，而且又和孫哲生、伍梯雲、胡展堂、廖仲愷諸革命槓槓人物，都能相處得翕然無間，決不是偶然而致的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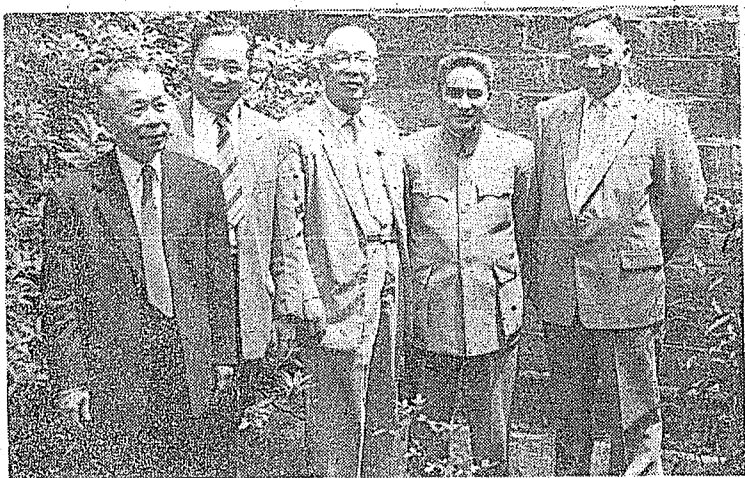
可惜我和秉常先生過從的這段時間只不過年許。我於廿九年八月，就奉命離渝返粵，接任廣東省政府祕書長的職務。而當我於卅二年回渝工作時，則秉常先生已於卅一年底奉派為駐蘇俄大使出國去了。他此去長達七年，直到三十八年才回來過一下。在他駐蘇的這段漫長日子裏，我們的工作性質不同，且又各忙各的，不特無晤面的機會，連信也未通過。然而我從政府外交方面的報導中，知道他的大使工作，幹得異常出色。尤其是爭取「中英美蘇四外長宣言」一幕，表現得最為精采。原來民國三十二年十月，美、英、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集會，討論戰後世界秩序問題，準備發表三國外長宣言。秉常先生獲知此事，認為我國抗戰最久，犧牲最大，對戰後和平問題，

必須爭取發言地位。於是立即展開活動，以謀我國加入「外長宣言」的簽名。但其時俄僑史太林對我漠視，而英之邱吉爾亦不甚關懷，同情我的只有美國。因而秉常先生乃以全力聯繫美國國務卿赫爾，獲取赫爾的大力相助。終於使我國參加於外長宣言，而成爲「中英美蘇四外長宣言」。由於這次四外長宣言所打下的基礎，跟着我國又被邀參加「開羅會議」。從而乃奠立了戰後世界「四強」的地位。秉常先生這次斡旋外交所表現的手腕和毅力，都是極爲卓越的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共匪全面叛亂，勢甚猖獗。而野心又至愚癡如李宗仁等輩，竟受敵利用，要求總統 蔣公引退，與匪「和談」，使局勢更爲不可收拾。是年三月，何敬之(應欽)先生出長行政院，發表秉常先生任外交部長，時秉常先生仍在駐蘇大使任內。蘇俄表面與我維持外交關係，而實際則一力扶植共匪，嗾使加緊叛亂，對蘇外交固無大可爲，而接任外長，又感難於展布，這使秉常先生頗爲躊躇。他考慮結果，只好遵命先行返國，於四月中由歐經港返抵廣州。時中央政府已遷粵，行政院何院長亦在此。秉常先生向何院長述職之後，堅辭外長一職。既蒙答允，即再赴歐洲，但未返蘇任所，而住於巴黎近郊。至該年十月匪僞政權成立，而俄帝又揭開假面，承認匪僞後，秉常先生乃宣告解除了駐蘇大使之職。

這次秉常先生由歐返抵廣州這段時間雖短，而我適任中央黨部祕書長，中央黨部亦遷穗市，乃獲與其有多次懇談，對他的忠黨愛國一片深心

，愈益敬佩。他之辭外長而仍掛着一個駐蘇大使的名義，蓋當蘇俄未正式與我決絕之前，仍欲運用其駐蘇多年的關係，設法盡量拖延待變，以期力挽狂瀾，直至最後一分鐘，才放棄了他的希望。他這種「知不可為而為之」的鞠躬盡瘁精神，



傅秉常先生（中）早年與梁寒操（左一）馬潤庠（左二）張炎元（右一）及本文作者（右二）合影。

實在是難得的。

秉常先生既已無職在身，而一些從蘇撤退出來同事的生活也要維持。他於是在巴黎拉丁區的聖哲街，和人合股開設了一家「香港樓」飯館。我於四十六年夏奉命訪美轉歐，視導海外工作。曾與何世禮兄同行抵巴黎，到他的香港樓拜訪，始知他迭經司法院長王亮疇先生敦促，又蒙總統蔣公電催，已將飯館讓給他人接辦，於五月中東裝東返。等到我在各地視導完畢返國時，他早在台北多時矣。

他返國後，受聘為國策顧問，次年三月，王亮疇院長逝世。總統乃提名徵得監察院同意，以原任副院長謝冠生先生升任院長，秉常先生為副院長。當時有些人對秉常先生過去的情形不甚明瞭的，只看到他的履歷所述，諸如交涉員、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、外交部次長、大使……等等，一旦被提名為司法院副院長，都不免覺得有點奇怪。殊不知他曾追隨伍秩庸、胡展堂、王亮疇諸法學名家精研法學，而且他在立法委員任內，關於我國「民法」的訂定，以及關於「五五憲法草案」的起草，都曾付出許多心血，具有很大貢獻。是以他原係香港大學的工科學士出身，而後來港大贈頒給他的却是法學博士，即以此故。就我個人說，使我更感高興的是，自秉常先生回國之後，總統蔣公以其去國日久，對國內情況一時或有不盡深悉之處，乃囑我對秉常先生多為關注。於是使我更接近他，有更多向他請益的機會。又我於四十九年五月，也奉命接任司法行政部部長職務，和秉常先生同在一座大樓辦公，而

且因為秉常先生兼任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」的委員長，故常有關於司法問題，與我交換意見，使我更獲不少他的卓識高論，私心實在非常欣幸。民國五十四年初，總統蔣公特派秉常先生為特使，前往中南美洲，慶賀墨西哥及智利兩國總統就任，並作友好訪問及宣慰各地僑胞。他道過美國時，且曾特往訪候孫哲生先生，並代達蔣公渴望其返國共襄反共建國大業。秉常先生行前，並和我商量怎樣向哲老進言方能達成任務。結果，哲老決定回國了，可是當哲老回來時，秉常先生却已遽歸道山，無法高高興興地抵掌歡敘，這真是最不幸的憾事。

秉常先生身體一向強健，精神更常愉快樂觀。雖然曾在體檢中發現有些微心疾，但他殊未以為意。有人說他赴美時，曾在機上預立一遺囑，謂為不祥之兆。其實他坐機上無聊，寫一遺囑，把要吩咐後人的話，都清楚地寫了下來，這正見其從容達觀呢。再看他逝前兩日，剛由台灣南部暢遊歸來。臨逝之夜，猶與友人促膝歡談。送客分手不數小時，便告仙逝，真可說得是幾生修來的福氣。

秉常先生逝世之晨，我將此噩訊報告總統蔣公，他甚感悼惜，垂詢傅的家屬情況，囑即請冠生院長善理秉常先生的後事，並對其尚在就讀的兩位女公子，善加照顧。秉常先生之喪，我亦忝為治喪會副主任委員之一，且又參與為其以黨旗蓋棺。駒光忽忽，至今不覺已過十年，追懷秉常先生的神采風儀，猶音容宛在，但他蹤跡已遠，內心實不禁有無限的思慕和感慨。